

宋再新 著

和汉朗咏集文化论

山东文艺出版社

和汉朗咏集文化论

宋再新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市中印刷五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6 印张 2 插页 133千字

1996年 6 月第 1 版 1996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29—1330—9
I·1168 定价: 7.10元

序

李 芒

世界上，一国有一国的国情，一国也有一国的文学；国情不尽相同，文学也各具特色。这种特色，有的国家比较鲜明，仿佛一个人的个性较强；有的国家就像具有一般性格的人，特色并不突出。日本这个国家，在古代，除了同中国和朝鲜来往较多以外，同其他国家几乎是处于隔绝的状态。这种国情上的特点，反映在文学中，也就使它的特色更加鲜明，个性比较突出。

日本文学同中国文学的关系源远流长。在古代，主要是日本连同接受汉字，也较多地接触了中国古代的诗文，曾经一度以汉字汉文作为行政和社交的文字工具，吟咏中国古诗，曾经蔚为大观。日本文学史记载，早在奈良时代（710—794）就出版了日本人创作的中国古诗集《怀风藻》（751）；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又相继印行了《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和《经国集》（827）等天皇敕撰的中国古诗专集。及至平安时代中期，本书阐述的《和汉朗咏集》又以崭新的姿态同世人见面。本书作者宋再新先生称这部书为“中日古代文学的交响曲”，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以自己的观点，阐发了中日古代诗歌的特色和异同，抓住本质性和代表性的问题，深入广泛地挖掘出足以印证自己观点的实例，予以解剖，进而指出：“这部集子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汉诗文与和歌熔为一炉，人们从中可

以了解平安时代的文学思想特征、中国诗文对日本平安时代贵族文学的影响、日本人对和歌创作的态度以及平安时代和歌文学的发展状况等当时的文化时尚。”所谓“当时的文化时尚”，作者认为：“平安时代的贵族崇尚唐文化，提倡华贵、风雅，……《和汉朗咏集》的编选思想也是追求闲适、绮丽。也就是说，只有符合这一标准的中国诗文佳句方得为朗咏吟唱对象，方能入选朗咏集。”并列出自居易的“花下忘归因美景，樽前劝醉是春风”、刘禹锡的“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撩乱碧云天”、元稹的“外人不识承恩处，唯有罗衣染御香”和温庭筠的“三秋岸雪花初白，一夜林霜叶尽红”等人点景抒情的入选诗句，以为佐证。作者着重指出，日本人自古非常喜爱白居易的诗，特别是“三五夜中新月色，两千里外故人心”（《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值对月忆元九》），“更是至今仍为日本人所爱诵，几乎任何一本高中汉文教科书都会收这两首诗”。（另一首是许浑《送王十八归寺寄题仙游石》中的一联：“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笔者注）

提起白居易的此联佳句，笔者不禁立刻想起了引用白诗最多的《源氏物语》来了。这本书的第十二帖，源氏因与兄皇的内侍胧月夜幽会被人发现，为免于受责而自贬须磨，于三五良宵思念首都和故人，同时想起的就是这句“两千里外故人心”。那么，日本人自古就独钟白居易，是否对他有全面的了解和客观的对待呢？回答是否定的。本书作者进一步指出：“讽喻诗是白居易诗中精华，《和汉朗咏集》也选有这些诗的诗句，不过兴趣仍同于前面所引用的诗句。如《上阳白发人》中的‘秋夜长，夜长无眠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井底引银瓶》中的‘婵娟两鬓秋蝉翼，婉转双蛾远山色’、《骊宫

高》中的‘迟迟兮春日，玉瓮暖兮温泉溢；袅袅兮秋风，山蝉鸣兮官树红’等诗句，经过平安时代日本文人文学观的过滤，已全无讽喻精神，只剩闲适、华美的意趣了。”

这就是说，日本的古代诗人对待白居易的讽喻诗，基本上采取了去其讽喻批判，取其撷景抒情的态度。对待其他诗人，也基本如此。

本书作者还认为：“平安时代是日本文化趋向成熟，独立的文学观已经形成的时代，《和汉朗咏集》就是这种文学观的最好体现，它选取日本汉诗文佳句的态度与选取中国诗文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些论断应该说都是切中肯綮，以这种观点阐发日本文化和文学的特点，在我国的日本文学和文化研究界，尚不多见，读过之后，会使人产生一种浓厚的新鲜感。笔者深信，宋再新先生的这本书，在帮助读者比较正确地理解和欣赏日本文化和文学方面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日本文化和文学的特色，大体上是在平安朝前半期形成的。在这之前于759年完成的古典诗歌总集《万叶集》，汇载了四百年间的和歌，作者除了皇族、贵族和高官以外，还包括僧侣、中下级士兵和平民百姓等；从歌风上看，可说是一个朴素刚健、洋溢着男性美的艺术阶段。从《万叶集》末期到905年以后成书的《古今和歌集》，就进展到婉转抒情、雅致而蕴含婀娜之美的境界。平安时代结束不久，初入镰仓时代（1192—1333）的1205年问世的《新古今和歌集》，在歌风方面又有发展，设景抒情往往交织着梦幻般的甘美情调，字里行间飘荡着音乐美和绘画美，唯美倾向十分鲜明。

在物语（小说）和随笔方面亦呈现着与和歌同步的面貌。1004年脱稿的随笔集《枕草子》，妙笔记述宫廷女后的生活情趣

和自然景物的四季变化。稍后涌现的长篇名著《源氏物语》(1008)，刻画皇族的爱情生活和人物的心理活动，同大自然的无穷变化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扣人心弦，被誉为表现了中庸与调和思想的最高境界。总之，这个时代的散文作品，同诗歌和中国的古诗一样，具有追求雍容华贵、轻灵风雅和闲适绮丽的唯美倾向。一部《和汉朗咏集》选择中国古诗所遵循的标准，完全同当时的和歌与散文著作的思想和艺术特点一致，表现了日本人的文化、文学和艺术观。

至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日本著名学者吉田精一关于日本文学特点的论述。他说：“日本文学，特别是接触欧洲文学以前的文学理念，叫作‘感物兴叹’、‘幽玄’和‘闲寂’，即以优美为主，外表即便单薄，余韵却是深幽的，并喜爱局部的充实。激烈的怒吼，……雄壮而崇高的风物和人事，殆无所见。”^①这说明日本文学自古就不注重描写人物的愤怒和雄壮崇高的事迹，而喜爱幽玄和余韵，善于经营长篇之中的局部，即各个段落。谈到这一点，吉田精一在同一篇文章指出：“一般地说，物语这种样式乃是平面性和并列性^②的，时间的推移、情节的展开同人物性格的发展，缺乏有机联系，部分同整体的结合并不严密，各个场面各自独立，彼此照应未必密切。这仍是从王朝具有代表性的物语，直到近世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③和现代川端康成的《雪国》古今相通的特色；而且同联歌与俳谐^④这种日本独特的由复数作者参加创作的一卷连续性的诗歌形式一脉相通，同绘画的画卷^⑤相似。”吉田精一还认为：“即便是受到欧洲文学启发的明治(1868)以后的现代文学，这种倾向也无根本性的改变。”

这些言论刚好从另外一面印证了已为《和汉朗咏集》所反映、并为本书作者所阐述的事实，亦即日本人的美学观和文学

特点。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反映、阐述和印证，这会对正确地理解日本人的美学观及其文学特点大有裨益。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一些中国研究家竟然认为《源氏物语》描写了围绕主人公源氏的权势之争及其阴谋，蕴含着对人生的尖锐批判等言论以后，更加深刻地感到多多介绍诸如《和汉朗咏集》一类著作的必要了。写到这里，笔者深信大家如能仔细研究这本书的观点，并同本序所引吉田精一的言论加以对照，就很可能对在阅读一些日本古典文学名著及对它们的评论文章时曾经泛起过的疑问，产生一种“原来是这样”的感叹。

1996年5月7日·北京

注：

- ①日本《万有大百科事典》第1卷《文学·日本文学》，小学馆1977年版。
- ②平面性，亦称平面描写，是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田山花袋（1871—1930）主张的描写手法。其特征是试图以各种可能的条件和氛围加以刻画，以再现现象的原貌，并以表面现象的描写来巧妙地体现内在的神韵，从而收到一种立体效果。并列性，亦称并列描写，指在一部较长的作品中，将各个场面并列起来加以描写，即引文中所谓“部分同整体的结合并不严密，各个场面各自独立，彼此照应未必密切”的描写手法。
- ③浮世草子，江户时代（1603—1867）俳谐和小说作家井原西鹤（1642—1694）于1682年发表长篇小说《好色一代男》，并将这种作品定名为“浮氏草子”。他的此类作品共分四类：好色类，武家类，町人类和杂话类。《好色一代男》属于“好色类”。
- ④联歌，即将一首短歌分为长句（五、七、五：十七音）和短句（七、七：十四音），由二人以上的作者分别按长短顺序吟咏。一般以三

十六句为一“歌仙”（一组）。这种联歌大都以一个长句和短句（合为一首短歌）组成一个小单元，内容上互相照应；到了第二个长句和短句，即可另起炉灶，内容上不必具有密切的联系，以下类推。仿佛是一组内容未必统一的联句诗。俳谐，亦称俳谐联句。日本室町时代（1392—1477）城市商业逐步发展，在素来以典雅为主的联歌的基础上产生了以诙谐为主的俳谐联句，除了变典雅为诙谐以外，其他方面无大变化。

- ⑤画卷，日本古代盛行的一种绘画。在长幅的画轴中，将图画和说明交互排列，卷起保存，打开后未必一次看完，因而故事也是并列绘制，段落纷呈。主要内容是物语（故事）、高僧传、战记、歌仙和人物肖像等。

目 录

引言 中日古代文学的交响曲	(1)
第一章 歌谣·和歌·汉诗	(13)
第一节 从日本古代歌谣说起	(13)
第二节 汉字传入日本前后	(18)
第三节 录下和歌第一集	(22)
第四节 日本人初作汉诗	(31)
第二章 日本汉诗文的兴盛与和歌的复兴	(36)
第一节 平安时代的贵族社会	(36)
第二节 崇拜唐文化的热潮	(37)
第三节 日本汉诗文的鼎盛时期	(40)
第四节 和歌的复兴	(43)
第五节 和汉交融的趋势	(50)
第三章 《和汉朗咏集》的文学价值	(55)
第一节 《和汉朗咏集》的诞生	(55)
第二节 《和汉朗咏集》的特色	(61)
第三节 平安时代的文学思想	(75)
第四节 独尊白乐天之谜	(80)
结语 《和汉朗咏集》与“和汉情结”	(90)
附录：和汉朗咏集	(95)

引言 中日古代文学的交响曲

在谈论日本古代文学时，很多日本人热衷强调日本传统文学的特殊性，甚至有意无意使之复杂化而令外国人感到神秘且难得要领。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其它因素使得客观公允地评价日本古代文学颇为不易。这是由于不少中国人会很自然地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习惯于用中国的文学标准来衡量虽用汉文创作但毕竟是日本文学之一部分的日本汉文学，进而用同样的尺度来评价日本古代的传统文学，因而对日本古代文学的认识有时会失之偏颇。在日本古代文坛上，不仅有以和歌为代表的日本传统文学与日本汉文学共存的现象，还有中国古代文学的被广为传播和欣赏，这三者的关系是理解日本古代文学的关键之一。恰巧在日本古代文学里有一部《和汉朗咏集》，它将中国文学、日本汉文学、日本传统文学三者的佳句共汇一集，可以说是记录下了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的文坛盛况。这部集子或许有助于我们中国人通过比较，窥知古代日本人的文学观，弄清日本古代文学的特殊性。

《和汉朗咏集》是中国诗文佳句、日本汉诗文佳句以及和歌佳句歌谣集，一般认为是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文学家藤原公任（966—1041）编集，具体成书年代不详。《和汉朗咏集》原

名《倭汉朗咏集》，后日本人嫌“倭”字不雅，根据将不雅的汉字改为吉利文雅的“好字”的习惯，才把《倭汉朗咏集》改称《和汉朗咏集》。关于《倭汉朗咏集》，在据传为释信阿于应保元年（1161）所作的《倭汉朗咏集私注》的序中开宗明义地解释道：“倭者，本朝也，本朝以歌述其怀；汉者，唐家也，唐家以诗言彼志。此诗歌之咏有秀逸则人皆诵之，故曰朗咏。”朗咏出现于日本的平安时代，据说原为用于启蒙学生的汉诗咏诵法，后发展成为吟唱汉诗文佳句以及和歌佳句的歌谣，配有曲谱并由笛、琵琶等乐器伴奏。

朗咏的出现同日本贵族文化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日本原无文字，至迟在公元四世纪汉字传入日本。日本接受汉字对日本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公元607年日本推古天皇的摄政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开始大规模学习中国制度，输入中国文化。从630年至834年，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八次遣唐使，其中因故中止两次，成功十六次。遣唐人员为了学习唐朝先进文化，以简陋的船舶和不发达的航海技术出使大唐，出生入死，备尝艰辛。不少人或葬身海底，或在途中为土人所杀。他们为日本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文化进取精神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感人的篇章。

随着遣唐使的派遣和唐朝文化的输入，日本社会掀起了崇尚唐文化的热潮，诸事模仿唐制，甚至日本固有的神道仪式也受到了唐朝文化的影响，真有全盘唐化的势头。894年，日本任命了第十九次遣唐使而终未成行，遣唐使制度遂告废止。遣唐使制度废止之后，日本社会进入了对输入的唐文化的消化期，日本固有文化也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得到发展。当时日本的公卿贵族在游乐宴饮中刻意模仿唐土的风雅、华丽，追求纤细、雅

致的情趣。因为在游宴中需要高雅的娱乐方式，于是原来用于启蒙学生的汉诗咏诵法便在这种背景下被引入贵族的娱乐中，形成了吟唱汉诗文佳句及和歌的新歌谣形式——朗咏。

朗咏的出现说明中国汉诗文在日本社会，特别是在贵族社会已较普及，标志着日本文学发展到了和歌汉诗文同时为人欣赏的阶段。正是《和汉朗咏集》保存下了平安时代朗咏的内容。虽说《和汉朗咏集》是一部类书性的佳句集，但同时也可以说是一部通过编选表达编选者文学批评思想的文学批评集。这部集子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汉诗文与和歌熔为一炉，人们从中可以了解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思想特征、中国诗文对日本平安时代贵族文学的影响、日本人对和歌创作的态度以及平安时代和歌文学的发展状况等当时的文化时尚。从这个意义上讲，《和汉朗咏集》简直就是日本平安时代贵族文化的缩影，是平安时代文学的百科全书，也是日本文学史、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和汉朗咏集》分为两卷，共收中国诗文佳句二百三十四，日本汉诗文佳句三百五十四，和歌二百一十六。上卷分春夏秋冬四部，又细分为立春、早春、春兴、春夜、子日（附若菜）、三月三日（附桃）、暮春、三月尽、闰三月、莺、霞、雨、梅（附红梅）、柳、花（附落花）、藤、踟躕、款冬；更衣、首夏、夏夜、端午、纳凉、晚夏、橘花、莲、郭公、萤、蝉；立秋、早秋、七夕、秋兴、秋晚、秋夜、八月十五夜（附月）、九日（附菊）、九月尽、女郎花、萩、兰、槿、前栽、红叶（附落叶）、雁（附归雁）、虫、鹿、露、雾、捣衣；初冬、冬夜、岁暮、炉火、霜、雪、冰（附春水）、霰、佛名等类。下卷为杂部，细分为风、云、晴、晓、松、竹、草、鹤、猿、管弦（附乐舞）、文词（附遗文）、酒、山、山水、水（附渔父）、禁中、故京、故宫（附

故宅)、仙家(附道士、隐伦)、山家、田家、邻家、山寺、佛事、僧、闲居、眺望、钱别、行旅、庚申、帝王(附法皇)、亲王(附王孙)、丞相(附执政)、将军、刺史、咏史、王昭君、妓女、游女、老人、交友、怀旧、述怀、庆贺、祝、恋、无常、白等子目。

可以看出《和汉朗咏集》的分类明显受到了《艺文类聚》、《白氏六帖》等中国类书的影响。在《和汉朗咏集》之前，平安时代的学者大江维时于960年编过一部《千载佳句》，将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一百四十九人的一千零八十三首七言诗中的佳句辑为一集，分为四时、时节、天象、地理、人事、宫省等十五部，二百五十八子目。976年至987年之间，在日本还出现了一部和歌总集《古今和歌六帖》，共六卷，分岁时、山水、动植物等二十五部五百一十七子目。《和汉朗咏集》中有六十九子目与《千载佳句》同，有三十五子目与《古今和歌六帖》同，内容上又有一百四十八首与《千载佳句》同，和歌有一百一十一首与《古今和歌六帖》同。几乎可以肯定藤原公任在编选《和汉朗咏集》时参照了《千载佳句》和《古今和歌六帖》，但同时他又承袭了在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中已见端倪、由《古今和歌集》(905)确立的强调四季以四季部类为先的编选方法。从《古今和歌集》始，以后的和歌集几乎都按春歌、夏歌、秋歌、冬歌、贺歌、离别歌、羁旅歌、恋歌、杂歌等分类、排列。《和汉朗咏集》将四季部类置于卷首且占全书一半的篇幅，从中亦可窥见藤原公任将和歌与汉诗文同处一集时既兼顾二者的特色又坚持自己文学思想的苦心。

《和汉朗咏集》中的每一类几乎都以中国诗文佳句、日本汉诗文佳句、和歌为序。汉诗文佳句一般是摘取汉诗、文、赋中

的两句为一首。集中所收中国诗文佳句以白居易的创作为最多，共有一百三十五首，元稹次之，有十一首，以下许浑四首，章孝标七首，杜荀鹤四首，刘禹锡四首，温庭筠三首，贺兰遂两首，王维、韦承庆、钱起、郢展、刘元叔、宋之问、李端、杨衡、郑师冉、赵嘏、谢偃、僧亘玄、陆侍御、鲍溶、罗虬、李嘉、傅温、陆翥、罗维（严维？）各一首。另摘自中国文的佳句有《史记》一首，《汉书》一首，《后汉书》一首，《文选》一首，《游仙窟》一首，《止观》一首；摘自赋的佳句有谢观七首，公乘亿六首，白居易四首，贾嵩三首，皇甫曾一首，张文成一首，无名一首。

平安时代的贵族崇尚唐文化，提倡华贵、风雅，作为贵族社会的流行歌集《和汉朗咏集》的编选思想也是追求闲适、绮丽。也就是说只有符合这一标准的中国诗文佳句方得为朗咏吟唱对象，方能入选朗咏集。如白居易的“花下忘归因美景，樽前劝醉是春风”、刘禹锡的“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撩乱碧云天”、元稹的“外人不识承恩处，唯有罗衣染御香”、章孝标的“顿令灯下裁衣妇，误剪同心一片花”、温庭筠的“三秋岸雪花初白，一夜林霜叶尽红”等。

从入选《和汉朗咏集》的诗文句数可以看出，平安时代的日本人对白居易可说是情有独钟，白居易的诗文佳句竟占了集中中国诗文佳句的一半以上。据成书于879年的史书《日本文德天皇实录》记载，838年日本官吏大宰少貳藤原岳守在检查唐船的货物时得《白氏文集》呈献天皇，据说这是《白氏文集》首次传到日本。藤原岳守因此功而在翌年受拔擢，官位升至五位上。从那时开始日本文人便独尊白居易，“文集”一词就专指《白氏文集》。从日本古典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到古代随笔集

《枕草子》，都受到《白氏文集》很深的影响。《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在她这部随笔集中录下了这样一段佳话：一天大雪时，一条天皇的中宫定子问道：少纳言，香炉峰雪若何？清少纳言听罢立刻让人打开格窗，自己去卷起帘子。因为她悟得中宫是以白居易的诗“日高睡足犹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遗爱寺钟敲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的诗意命她开窗望雪。又有一次，头中将藤原齐信知清少纳言颇有才气，便以白居易的一句诗“兰省花时锦帐下”试之，清少纳言立时以半首和歌“更有谁人探草庵”作答，以示她已知那句诗的下句是“庐山雨夜草庵中”。清少纳言颇为自得地录下这些佳话，因为这表示她具有当时的最高教养。现在的日本高中日本文学史教科书上几乎都有清少纳言“香炉峰雪拨帘看”这段至今脍炙人口的佳话。“遗爱寺钟敲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兰省花时锦帐下，庐山雨夜草庵中”这两联诗都收入了《和汉朗咏集》。

平安时代的日本文人为什么如此尊崇白居易，而冷落了李白、杜甫，就连日本人也觉得这是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和汉朗咏集》的校注者川口和雄认为可能是因李、杜二人的诗过于情绪化、过于倾诉感慨而不合藤原公任的入选标准。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那波道圆在《白氏文集后序》中认为白居易的诗文“当时则礼吏部举选人皆以为准的，王公卿相无不读其文，嫖妇媚妓无不咏其词”；亦由于元稹将白居易的诗文编为《白氏长庆集》，白本人又加自记自解，藏于各处，故无亡逸纰缪，“夫自宝之如此，人奉之如此，宜哉，称于后世，称于外国也矣”。他的解释是因为白居易在生时便有高名，且本人又注重自己作品的整理和保存，故其作得以远传国外。其实，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某位中国诗人的作品传到外国或许是

偶然的，但还要看外国人是否接受。白居易的作品能够集中满足日本平安时代文人的鉴赏需求，特别是经过选择的一些作品符合日本人的审美标准，这大概是日本贵族社会喜爱白居易作品的最重要原因。

在积极热情地接受唐文化的平安时代，日本人虽对白居易的作品推崇备至，但并非无条件地接受、不加分别地欣赏。《和汉朗咏集》即表现出这种态度，集中所收白居易的作品均为闲适、雅致的诗文佳句，不见伤时忧民、社会批判的内容。如“但有双松当砌下，更无一事到心中”、“背烛共怜深夜月，踏花同惜少年春”、“青苔地上消残雨，绿树荫前逐晚凉”。至于“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三五夜中新月色，两千里外故人心”更是脍炙人口，现在的日本高中汉文教科书都将它们收入其中。讽喻诗是白居易诗中精华，《和汉朗咏集》也选有这类诗的佳句，不过意趣仍同于前面所引的诗句。如《上阳白发人》中的“秋夜长，夜长无眠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井底引银瓶》中的“婵娟两鬓秋蝉翼，婉转双蛾远山色”、《骊宫高》中的“迟迟兮春日，玉辇暖兮温泉溢；袅袅兮秋风，山蝉鸣兮宫树红”等诗句，经过平安时代日本文人文学观的过滤，已全无讽喻精神，只剩闲适、华美的意趣了。

平安时代是日本文化趋向成熟、独立的文学观已经形成的时代。《和汉朗咏集》就是这种文学观的最好体现，它选取日本汉诗文佳句的态度与选取中国诗文的态度是一致的。菅原道真曾被任命为后未成行的第十九次遣唐使，死后被尊为“学问之神”，至今仍得享正做大学梦的莘莘学子的香火。但《和汉朗咏集》仅选他描写宫廷生活的华丽诗句，却不取他诉说失意、忧郁的作品。要用自己可能并不会说的外国语言、采用外国的文

学形式表达自己的感情，这实在是勉为其难，甚至有些无奈。尽管平安时代的文人作了最大努力，但他们的汉诗文作品中仍流露一些日本语言的痕迹，日本人称之为“和习”或“和臭”。《和汉朗咏集》收有日本汉诗文佳句三百五十四首，其中却很少带“和臭”的词句。这几点都说明编者有极高的鉴赏水平和严格的编选标准。

日本人作汉诗据说自大友皇子（648—672）始。751年日本有了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对《和汉朗咏集》中几乎未收宽平年间（889—899）前的汉诗，这表明编者认为宽平年间前的日本汉诗文尚嫌稚拙，未达到当时所流行的唐文学的水平，而《和汉朗咏集》所选中的日本汉诗文作品已堪与唐文学比肩。《和汉朗咏集》收有日本汉诗佳句二百五十三首，这些汉诗佳句颇见功力，有些已俨然唐风，故令《和汉朗咏集》的编者自信将这些佳句与中国诗文佳句合为一集而决不逊色。如菅原道真的“送春不用动舟车，唯别残莺与落花。若使韶光知我意，今宵旅宿在诗家”，菅原文时的“笙歌夜月家家思，诗酒春风处处情”、“西楼月落花间曲，中殿灯残竹里音”，源顺的“随岚落叶含萧瑟，溅石飞泉弄雅琴”，大江朝纲的“落花狼藉风狂后，啼鸟龙钟雨打时”等，确实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平安时代的日本文人受中国唐初仍重骈体文风气的影响，掌握骈文的作法已相当纯熟，对中国典故亦可信手拈来。《和汉朗咏集》收录的日本人所作文赋佳句多达一百零一首，可见编者对骈文和对偶句的厚爱，如纪淑望的“逐吹潜开，不待芳菲之候；迎春乍变，将希雨露之恩”、藤原笃茂的“晋骑兵参军王子猷，裁称此君；唐太子宾客白乐天，爱为吾友”、大江朝纲的“胡雁一声，秋破商客之梦；巴猿三叫，晓沾行人之裳”。从这